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经典范式：《易县清西陵》

A Classical Paradig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Yixian Western Royal Tombs of the Qing Dynasty

周悦煌 | ZHOU Yuehuang 王其亨 | WANG Qiheng 王巍 | WANG Wei

张凤梧 | ZHANG Fengwu

摘要：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的《易县清西陵》，既是立足于中国明清陵寝制度的整体研究，又是最早、最全面的清陵个案研究。本文通过搜罗相关材料，回溯刘敦桢著《易县清西陵》的学术时代背景，以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理路为脉络，从方法论角度析解《易县清西陵》，明确刘先生从建筑社会性视角出发、依托史料考据的文献学传统、借鉴考古学实证方法、贯彻营造学社整体研究思路、全面整合过往研究经验、按照建筑功能对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最高意识形态的陵寝建筑展开研究的整个理路过程，进而归纳《易县清西陵》体现出的开创性研究方法，为中国明清陵寝乃至古建筑研究提供范式参照，同时结合后人研究成果，补漏疏证，阐明和解决具体史学问题。

关键词：《易县清西陵》、中国营造学社、明清陵寝、方法论

Abstract: *Yixian Western Royal Tombs of the Qing Dynasty*, published in the fifth volume and third issue of *Journal of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the overall study based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usoleum system, but also the earli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case study on Qing Dynasty mausoleum. By searching the relevant materials, this paper traced back to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LIU Dunzhen's writing of the article, taking the academic path of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s the context, and analyzed the *Yixian Western Royal Tombs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Clearing LIU's whole circuit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tectural society, relying on the philology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data examination, referencing empirical archaeological method, implementing the overall research ideas of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comprehensively integrating of past research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architecture function to study the mausoleum architecture which can best reflect the highest ide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Then summarized the classic research methods that were reflected in the *Yixian Western Royal Tomb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provide a paradigm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mausoleu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ven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At the same time, combin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later generations, filling the gaps, and clarifying and solving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problems.

Keywords: *Yixian Western Royal Tombs of the Qing Dynasty*,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Imperial tomb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ethodology

作者：

周悦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其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巍，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讲师，历史建筑保护工程教研室主任；

张凤梧（通讯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中华语境‘建筑-人-环境’融贯机制的当代营建体系重构研究”（基金号：52038007）。

DOI: 10.12285/jzs.20210428001

1934年9月，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刘敦桢携成员莫宗江、陈明达考察清西陵，继日本学者关野贞、竹岛卓一等人之后再次对其展开测绘；同时结合史实，判定清陵“在结构上、装饰上、几无特征可言也”，遂以“平面配置”与“地宫结构”为主要研究内容，完成长文《易县清西陵》，重点对清西陵的营建始末、组群平面形制演变、地宫结构等方面详细剖析。文章以清西陵为主体，结合清

东陵诸陵建制特征，立足整个明清陵寝的传承沿革对比解读，既是基于中国明清陵寝制度的整体研究，又是最早最全面的清陵个案专题。如此鸿文，在当时无疑对营造学社乃至整个建筑史研究都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和突破，也是汇集所有先进史学观念的集大成者。除秉承传统的经史考证方法外，也遵循朱启铃先生倡导的营造学思维，同时西学东用，运用类型学方法关注形制演变，结合实物

调查和美术史研究方法,在满足中国古建筑实地调查需求的基础上,特别选取清西陵为研究对象,首次对样式雷图档“何为初稿,何为实施之图”进行考证,在中国建筑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易县清西陵》研究缘起

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接受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影响的留学归国建筑师,开始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要素运用到建筑设计当中,同样,中国建筑史学界也从艺术形式的角度尝试发掘中国建筑的独有风格特征。随着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逐渐兴起,中国建筑界开始对过往理论体系进行自省,随之而来的是从建筑社会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建筑形制规律。出于对社会文化史观的价值认同,相较梁思成、林徽因等主张结构理性、形式风格的研究观念,刘敦桢更关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不同建筑构造在整个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从社会背景的角度对建筑进行分类,用纵向对比的方法探讨建筑与人和社会的逻辑关系,试图更清晰地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建筑的发展成因。

与此同时,墓葬由于遗存丰富并且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古代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一直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界研究古代社会文化价值最重要的实物载体。受此启发,刘敦桢意识到,陵寝作为掌握国家行政资源、管理国家的帝王的墓葬,等级最高,无疑承载着中国历朝历代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反映中国古代建筑营造观念的重要组成。因此,地上遗存最完整、文献史料最丰富、时代延续性最强的明清陵寝,自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极佳的实证对象。进入营造学社以后,刘敦桢相继尝试撰写了《大壮室笔记》《明长陵》等陵寝相关文章,通过挖掘陵寝的形制特征和历史沿革,推及营建过程中的社会政治背景,更好地理解建筑的演变机制。而其中开创性的清代陵寝研究经典——《易县清西陵》,正是在中国营造学社构建起的学术体系基础上完成的。

二、中国营造学社构建的学术体系基础

1. 以术语名词的汇辑释义为切入

1919年,朱启铃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丁丙抄本《营造法式》,遂就此拉开中国传统营造学研究的序幕^[1]。

1930年1月,中国营造学社社址改迁于北平^[2],从此开创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一系列先河。论其创办缘由,朱启铃再次强调了“营造”之于建筑史学的重要意义,“营造所用名词术语,或一物数名,或名随时异,亟应逐一整比,附以图释,纂成营造词汇,既宜导源训诂,又期不悖于礼制”^[3]。其中所提的附以图释、增辑图史,又是在清《工程做法则例》等文献有法无图的体系之外作出的重要方法创新^[4]。在《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整理之余,以“制为图纸,演作公式”为最终目的,1931年9月朱启铃委任梁思成着手搜集整理《营造算例》,于翌年集结出版,在保证清代建筑、官式建筑、造作工匠体系的前提下,以存其真,归纳演绎的方法来解决清代建筑术语问题^[5],梁思成认为其价值远胜《工程做法则例》^[6]。1934年6月,为解读《营造算例》和《工程做法则例》中的怪名词,梁思成编著的《清式营造则例》出版,终使术语名词的释义初见成效,也于“研究清式建筑初辟途径”^[7]。

在此背景下,作为工程做法、图样影片、文献史料、实物留存均全面齐备的明清陵寝,无疑成为营造学社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访寻“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进行相关营造词汇纂辑的基础上,特别指出“陵墓一种”,因其有“工作做法,及明细记载者,亦关工事,又图样,应以本社汇集所得,及中外人印行之图示影片,附以卤簿礼器冠服诸端”^[8],当“别立一门”,同时配合“营造四千年大事表”的采辑,以“文献与遗物为衡”,广泛搜集“经史百家”“方志类书”,将“实物、图样、摄影、图志、古籍”等资料综合运用,逐渐明晰陵寝建筑

中“词汇”“制度沿革”“工程”等各方面内容。寥寥数语,已高瞻远瞩地将陵寝研究所需的基础资料 and 核心要义概括了然。^[9]

亦基于此,刘敦桢方能在随后发表的《易县清西陵》中游刃有余地将清代陵寝相关怪名词逐一呈现,从明清陵寝的各建筑名称到清西陵帝后妃园寝的地宫结构做法,290余个术语名词清晰地反映了明清陵寝的形制沿革和称谓嬗变,有如祿恩殿^[10]、启运殿与隆恩殿的明清差异,菓楼、膳房与朝房的清朝关内、关外建筑叫法,“罗圈墙、面阔红墙”等明陵未有建筑名词;再如一向神秘的陵寝地宫,依靠样式雷图的整理鉴别,使“龙须沟、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头层门洞券、明堂券、二层门洞券、穿堂券、三层门洞券、金券、宝床、梓券”等一套地宫结构术语公诸于世,“小夯码灰土、海墁石、大夯码灰土、背后砖、背后土、蹬券、三伏三券、砖平水、两山背后灰土”等工程做法用词尽数清晰,是为前期对术语名词释义不懈努力的丰硕成果。如若脱离建筑术语的研究解读,将直接影响对陵寝建筑的科学认知。

2. 以样式雷图档的整理研究为契机

作为架构中国建筑史学的基石,样式雷图档与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则例》相并重,早在1914年就已引起时任民国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铃的关注,随后自营造学社创建之初,便开始抢救性地搜集、整理和研究样式雷图档^[11]。

民国19年(1930年)五月,为防止样式雷图档继续散佚流失,朱启铃紧急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建议购存,函中多次强调图档的弥足珍贵,是为前民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另如一向神秘的陵寝地宫,亦可借保存之图样展开公开研究,“实于营造学、考古学均有重要之价值”^[12]。该函作为“社事纪要”的重要内容刊布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与其同时刊载的还有学术史上第一份样式雷图档原始目录——《原开略目》,其中陵寝相关的图档烫样目录见图1^[13]。

1930年六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商得董事会同意拨款五千元，全数购入除圆明园三海及近代陵工之模型27箱外，尚有各项工程图样数百种”^[14]。然而这些图档还是有一部分流入他国人士之手，如“清东陵风水形势全图”“清西陵地势全图”及数千件“崇陵工程文档”等被日本学者荒木清三收购，至今仍存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囿于雷氏后人仍在四处求售，朱启钤再次强调购存宫苑陵墓模型图样，并嘱及时修理残破烫样。^[15]

在对中法大学和北平图书馆所藏样式雷图样整理审定的过程中，又相继发现大量陵寝地宫平面、剖面图，其上尺寸、标注、材料等信息完备，近乎完整地重现了清代陵寝地宫的设计过程，价值甚高。学社随即组织人力对北平图书馆藏陵寝诸图进行重摹，清永陵，孝陵、景陵、惠陵、孝东陵、景妃园寝、定东陵等东陵帝后总平面图，以及昌陵、崇陵、慕陵、昌西陵、慕东陵、崇妃园寝等西陵地宫平面和剖面图均在《易县清西陵》中一一呈现^[16]（图2、图3），为研究陵寝形制及地宫情状提供了重要史料^[17]。刘敦桢在文中提到：“以雷氏诸图所载尺寸，换算公尺，与实状核校，于是诸图中何为初稿，何为实施之图，亦得以证实。”这在当时属于震古烁今的学术贡献，然而或囿于篇幅，此项成果并未在文中凸显，学社后期也未发表相关论述予以说明，实为一大憾事。1946年营造学社解散后，诸如东西陵路程图、东西陵全图、定陵圈分整图等图档被分散于文物整理委员会和清华大学，未能统一保存。

3. 以古籍文献的整理为前提

整理古籍文献一直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使命，以图籍为主，与营造相关的文献，均极力访求。工程籍本有如《惠陵工程备要》（图4），即立足于营造立场，以记录营建工程为架构，广征史料^[20]，着实有别于传统典章制度中仅描述营建既成后的制度体例。以上备要会同《崇陵崇妃园寝工

仲春系統之資料 零星散失 消歸烏有 豈不可惜 至所需價格 從前恐望頗奢 索價三萬元 近據原介紹人報告 疊經磋商至七千五百元 似可就範 鄙人正在研究中國營造學工作之際 故於雷氏家藏遺物 樂為致求 并希望於最短期間 使此項圖型 得一妥善之安置 貴會主持文化 保存國粹 想於斯舉 必有同感 用特繕通經過 鄙見所存 專函奉達 倘希鑒議及之 幸甚幸甚 此致

原開略目

開明園全份圖 中路立樣全圖 中路各殿座圖 中路防院圍中路天地一家春園明財殿
九洲清宴殿奉三無私殿德堂共殿六百五十六間全圖 北路文瀾閣圖 思順堂分圖 慎
德堂立樣圖 慎德堂圖 各路地基圖 雙鶴齋地勢圖 慎德思永閣 開明園內外河運圖
河道暢春園圖 內園河道圖 外園河道圖 開明園各路樓型一份 長春園圖 長春宮
樓型 繪春園圖 錦紅堂圖 南北中三海尺丈做法工料樓型 瀛臺宮殿全份
南北海尺丈圖 南北海做法尺丈說明書 東西陵路程圖俱全 東西陵樓型 東陵全圖
及各陵分圖做法 西陵全圖及各陵分圖做法東西陵各妃陵園 定陵園分整圖 冊樓型 慕
陵園 皇帝陵小卷 木樓型 清永陵圖 太后陵樓型二份 各陵做法說明書各尺丈做法
說明書 陵工略節做法 大木圖小券 雙方 誠各說明書尺丈做法 地宮金井一份俱全

社事紀要

寶頂券樓型一份 大殿木架構造模型一份 丫峯山宮殿做法 妙峯山殿座各圖 萬壽慶
典彩欄點景圖

以上係號各介紹人交來雷氏藏品目錄略加詳比所作務於原目不失真相又原目有照數
完全出售錄不存等語應即附記

(3) 歡迎日本伊東博士

本年六月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工學博士伊東忠太郎 來社訪問朱先生 晤談竟
日 頗恨相見之晚 旋由故宮博物院特別招待 朱先生陪同周覽登宮全部 復由社公
宴於中山公園董事會 由介紹與在座之名流學者相見 并請伊東博士演講「支那建築之
研究」 經錢稻孫君 譯以華語 伊東博士 為日本工學泰斗 專研究東洋建築史 庚子
之役 親自將北京宮實測製圖成「清國北京皇城寫真附述解」及「北京皇城建築裝
飾」 又曾見大同雲岡石窟 著「支那山西雲岡石窟寺」(戰國華第一九七及一九八兩
期) 諸書(其演說見本刊)

(4) 本社名義之確定

本年七月 年度更始 本社致函文化基金會 正式宣布 以後適用中國營造學社名
義 仍由朱先生擔任主任 對於文化基金會 完全負責 茲錄其原函如左

图1：《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样式雷图档《原开略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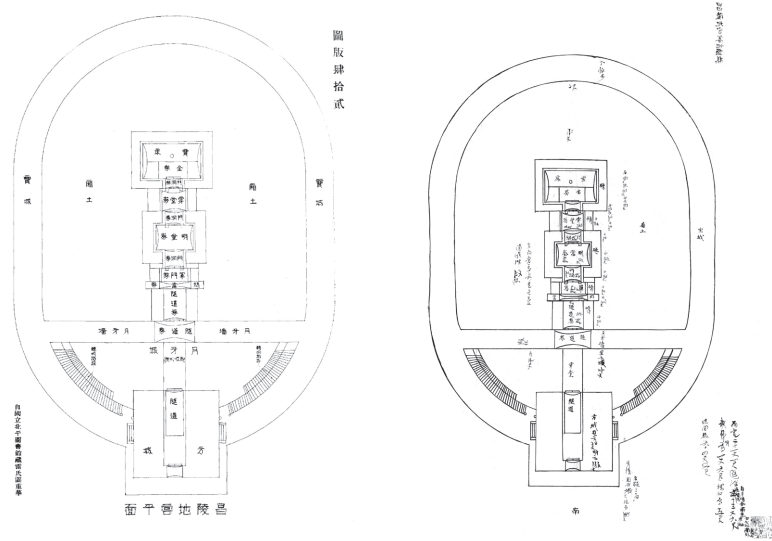


图2：营造学社描摹“昌陵地宫平面”图(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昌陵地宫券地盘样”图(右)^[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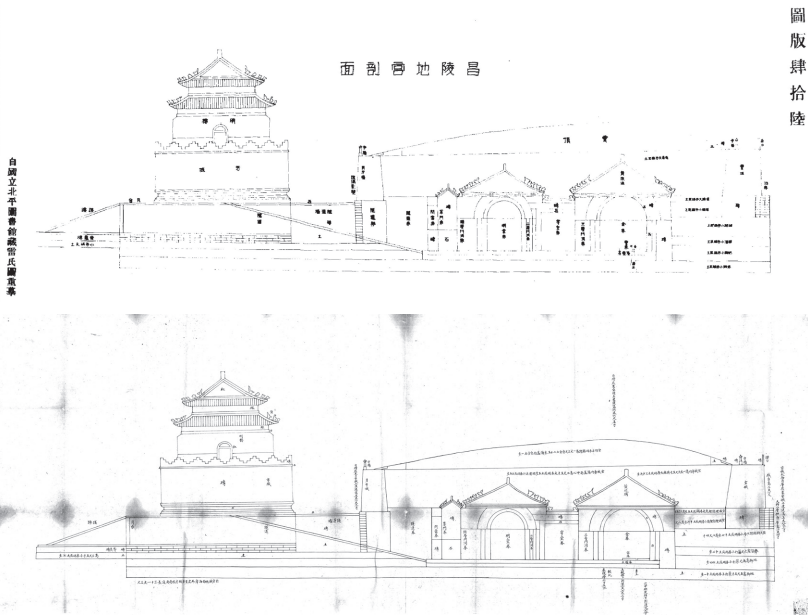


图3：营造学社描摹“昌陵地宫剖面”图(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昌陵地宫券座立样”图(下)^[19]



图4:《惠陵工程备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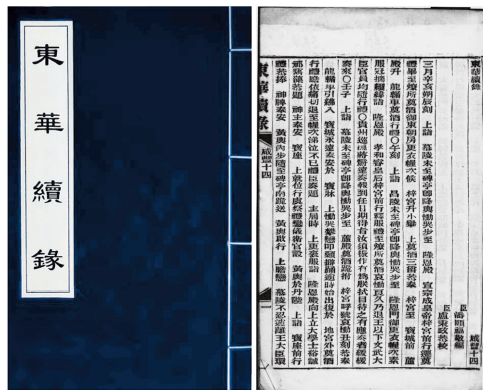


图5:《东华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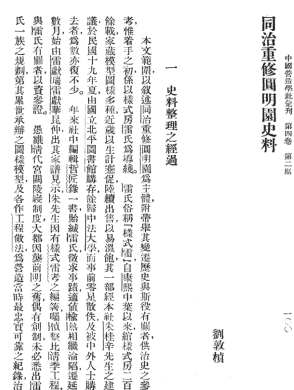


图6: 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

程做法册》成为《易县清西陵》推及陵寝地宫做法的重要史料。此外，营造技术古籍类尚有《旨意档》《堂司谕档》数册、《清内廷工程档案》（铅印本）一册，其中不乏“高宗裕陵殿宇油画见新工程案”这样的陵寝工程档案。

统揽《易县清西陵》全篇不难发现，其中索引的文献史料，基本以《明史》《大清实录》《大清会典》等官方典章为基本框架，同时辅以《东华续录》（图5）以及《清史稿》《易水志》《历代陵寝备考》《燕都游览志》《昌平山水记》等文人著述，穿插陈璧《望嵩堂奏稿勘修西陵》、内务府《事简档》等宫廷档案补充论证，史料构架完整，是研究中国明清陵寝建筑历史沿革的典型范式。

4.《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为先探

在术语名词、史料、图档等基础资料足够储备的前提下，围绕清代皇家建筑，刘敦桢率先对清朝同治时期重修圆明园的去来龙进行了详细梳证，成为后续诸多建筑个案研究的例证参考（图6）。

文章清晰描述了史料整理逻辑，以样式雷家族、图档、相关工程的对比考证为线索，以雷氏六代参与、冠绝诸园、遗物众多的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为切入展开论证，研究视角犀利准确。就此，以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雷氏文件《旨意档》《堂司谕档》等工程档案为核心，围绕《清实录》《大清会典则例》《翁文恭

日记》等官私著述、故宫文献馆藏清内务府档案《各座已做活计做法清册》进行铺陈，结合数千件图档、烫样，将圆明园的重修始末完整呈现。依托缜密的史料整理体系，文章逐次对圆明园的历史沿革、重修背景、工程明细加以阐明，将工官制度中所涉的机构设置、工程造价、勘估监修、承造人员等细节穿插揭示，更对样式雷画样烫样的设计流程、雷氏家族的身份经历、具体图档的整理鉴别一一廓清，无愧为“清代皇家建筑工程个案研究的开山杰作”^[21]。

“圆明园样式雷图档研究的突破，为其余上万件图档的整理研究展现了光明前景，但也清晰表明，后续工作还必须全面细致地考查极其丰富的清代皇家建筑实物遗存，深入地系统地梳理秘藏官禁又卷帙浩繁的相关工程档案。”^[22]这是对后续诸如《易县清西陵》研究的重要启示。

5.以实物测绘调查为研究方法的重器

1932年，德国建筑学者柏世曼被聘为学社通函研究员。早在1906年，柏世曼就以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官方科学顾问的身份来华，1907年相继到访清东陵和清西陵，在拍摄大量实物照片之余，完成了近百页的图文手稿和测绘图纸^[23]，以上成果后被收于1925年出版的《中国建筑》赠予营造学社，“为中国营造学社‘按图索骥’进行古建筑调查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24]，《易县清西陵》中引用的泰陵龙

凤门平、立面图，即为柏世曼当年的测绘成果（图7）。

随着英国叶慈博士以及日本伊东忠太、关野贞等一批国外学者相继赠书交流、莅临参观讲演，使营造学社“对于国际学术界贡献所知之使命日以密接”^[25]，也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建筑史与世界文化艺术的密切关联^[26]。为更加透彻地研究中国建筑，“作为三年文献研究所产生自然之结果”^[27]，1932年4月，以蓟县独乐寺的测绘为起步，学社的工作大纲开始转向实物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双重模式，摄影测绘成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朱启铃不无自豪地称之为“我国学术界空前之贡献”。在这样的方针部署下，决定“先于最短期内先完成明清法式之工作，于下期开始再进而从事金辽元之遗物调查……北方搜采先从近地着手”^[28]。河北境内的古建筑调查工作旋即相继展开。

在加入营造学社之前，时为中央大学建筑系教师的刘敦桢就已偕濮齐材、张至刚等到访北京昌平明长陵，调查测绘了十三陵神道各主要建筑及长陵总平面，成为当时国内大学建筑教学中最早的一次古建筑科学考察活动^[29]，此次活动虽因历史原因略显仓促，未能将其余各陵逐一调查，但仍为明清陵寝的测绘和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932年7月，随着刘敦桢抵达北平出任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结合之前积累的测绘经验，加之学社的工作重心调整，刘敦桢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的测绘调查任务中，民国23年（1934年），相继前往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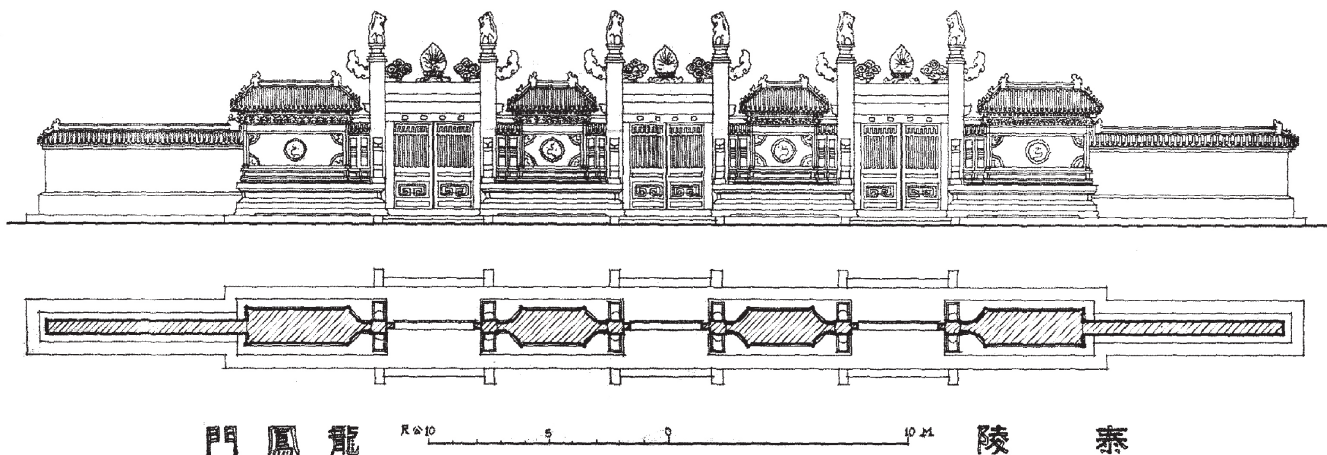


图7:《易县清西陵》中所引柏世曼“泰陵龙凤门”测绘图

北西部展开调查,九月,偕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二人抵达易州,以样式雷图的考证为根本目的,开始对西陵展开测绘,因前期已对相关样式雷图有过描摹,故测绘工作十分顺利,也为后续的对比较研究节省了时间。

总体来看,此次对测绘的充分应用,又是在前述《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研究方法基础上的全新突破,进一步提升了测绘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地位。

三、研究方法的系统构建与应用

在学社整体研究思路的铺陈下,刘敦桢结合清西陵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结构分明地析解了明清陵寝制度及建筑特征。

1. 文献史料考证

该方法主要应用于“导言”与“营建年代”两章节。文章开篇援引《光绪朝大清会典》,结合实物照片简明扼要地罗列各陵寝建筑序列,同时逐一说明诸帝后陵寝的陵名、墓主年号、庙号(谥号)、地理位置等信息,一目了然。

论及陵寝地宫,刘敦桢在未目睹明陵地宫的情况下,仍然依据《明史》中“异

隧”“虚右圻”等字眼准确判断其为数圻异隧之结构,足见史学功力。由明清陵寝地宫结构差异,可以推及清朝另建后陵的缘由:“清制凡皇后先帝而崩,或稍后而梓宫未葬者,例与帝合葬一陵。惟玄宫既闭,不忍复启,故后之后死者,除昭西陵相距较远外,大都于帝陵附近,别营佳城;如前表中孝东泰东诸陵,数量之众,为前代所未有。此殆因清代地宫结构,自琉璃影壁经隧道,明堂,穿堂,至安置金棺之宝床,皆南北一贯相承,无明陵数圻异隧,随时启闭之便,致不得不另为营建者歟?”受帝后薨逝时间以及地宫南北纵贯结构的

影响,清朝一改明朝帝后合葬的制度,重启汉代另建后陵的做法,成为有别于明陵的一项重要变革。

在“营建年代”一节,刘敦桢主要依据《清实录》《东华录》《东华续录》等文献,相继对各帝后陵寝的“地点、陵址相度人、始建时间、完工时间、入葬时间、工程主管”等内容一一考证,具体见表1。

在汇总各陵寝基本信息的同时,还考证了明代拂尘殿组群形制,昌陵地宫建成时间,慕陵陵址更易的来龙去脉、陵名确定、隆恩殿形制沿革等史实问题,为全面认识清陵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易县清西陵》中提及的各陵寝信息

表 1

陵名	地点	陵址相度人	始建时间	完工时间	入葬时间	工程主管
泰陵	易县太宁山太平峪兴隆庄	怡亲王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		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	恒亲王弘晔、内大臣常明、尚书海望
泰东陵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月	恒亲王弘晔
昌陵	易县太宁山太平峪			嘉庆八年(1803年)八月		
昌西陵			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		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	工部尚书阿灵阿
慕陵	易县龙泉峪	庄亲王麟庆、大学士戴均元	道光十一年(1831年)	道光十五年(1835年)		
慕东陵	易县双峰岫		道光十一年(1831年)	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	咸丰五年(1855年)	
崇陵	易县金龙峪	浦伦陈璧等	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		宣统七年(1915年)十一月	载洵

注:表中空格是全文未予说明的内容

2. 实物与文献、图像互证

在引征史料的前提下，实物与文献对比互证的方法被大量运用。略如慕陵石祭台的位置问题，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四十四“工部·陵寝”记：“慕陵……月台前为白石祭台，广二丈一寸五分，纵五尺五寸，高四尺七寸，上陈石五供一分。前为叠落，护以石栏。”经实地调查，石祭台应在石泊岸之南，而非记载的叠落之上月台之南。再如《东华续录》载宣宗遗诏，仅不许建圣德神功碑亭，似仍然保留明楼建制，然而实际上慕陵既无圣德神功碑亭，又无方城明楼。以上差异如若未经现场调查而尽信文献，则很可能对慕陵陵制的认识有所偏差。

此外，刘敦桢还搜集了多张影像照片用作实物比对，其中借助日本学者佐田弘治郎所著《奉天昭陵图谱》中的昭陵月牙城实景，可以清晰发现关内泰陵与关外昭陵方城踏跺的形式差异（图8）。从慕陵与昭陵隆恩殿间的形制对比，又可窥见二者的传承沿革关系，从侧面佐证了文献所述慕陵“敬绍先型，谨遵前制”的真实性（图9）。再有，通过实地调查，对照样式雷图，做出了崇陵效仿定、惠二陵的准确判断^[30]。

3. 图示分析，类型归纳——横向比较

文章最大的特点，是接续《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对样式雷图的整理与利用，在研究图档的基础上结合测绘成果，运用西方类型学方法总结归纳组群及建筑特征。

(1) 基于样式雷图对比分析组群布局

在帝陵总平面比较中，刘敦桢指出：“帝陵建筑，依其分布情状，可以神道碑亭为中心，划为前后二部。”^[31]据此，可重点围绕碑亭与龙凤门、碑亭与石桥的位置关系展开讨论：通过龙凤门（五牌楼）与碑亭间的距离对比，可获悉清朝后四陵在总平面设计上的相互借鉴关系；而石桥与碑亭间的位置关系，又可归纳为孝陵、景陵、慕陵三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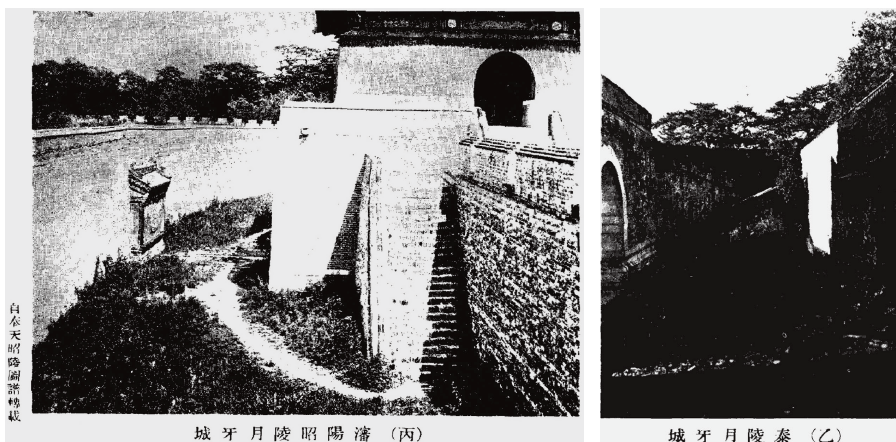


图8：《奉天昭陵图谱》昭陵月牙城（左）；泰陵月牙城（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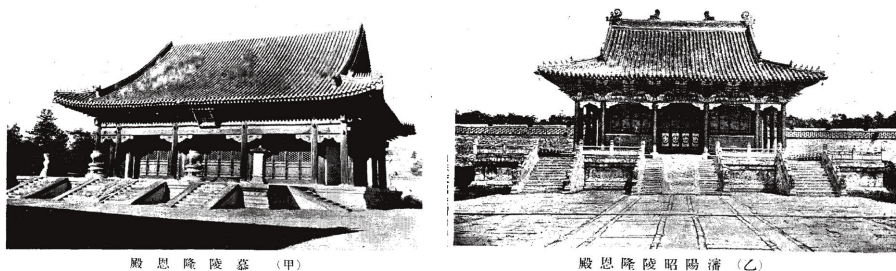


图9：慕陵隆恩殿（左）；昭陵隆恩殿（右）

(2) 依据测绘图纸归纳总结单体形制

在单体建筑方面，刘敦桢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各殿座建筑进行详细比较，具体包括朝房、隆恩门、东西配殿、隆恩殿等。整体而言，重点依据柱网间的排列方式，分别将隆恩殿、隆恩门、配殿、朝房平面形式归结为五种、三种、两种及三种类型（图10）。这些形制差异，无疑受社会形态和等级制度的直接影响，反映出最真实的政治生态，通过陵寝建筑的结构演变，可以管窥清代官式建筑的发展进程。

在此基础上，依据实测数据，对相关建筑进行尺度对比，如文中提到：“第昌陵宝顶较泰陵高数尺；隆恩殿、圣德神功碑亭亦特壮大；而配殿、隆恩门、朝房等，面积高度亦略有增益”；“（慕陵）神道碑亭，较昌陵稍小”；“（泰陵）碑亭……与圣德神功碑亭略同，但面阔进深，仅及前者五分之二”。以上结论如若脱离实测，或者没有刘敦桢敏锐的建筑思维做支撑，是很难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4. 明清陵制的嬗变比较——纵向剖析

对于清朝关内陵寝规制的研究，刘敦桢在充分对比清朝关内关外陵寝方城明楼、隆恩门、隆恩殿等建筑形制后作出判断：“清陵之在关外者，与关内诸陵，相差甚巨，足证入关后所受明陵影响，实较关外之陵为甚。”同时认为：“西陵之配置，系仿效东陵，而东陵又以明长陵为规范也。”就此依据实地调查，列举了多条明清陵寝建制的因袭与差异，如大红门、具服殿与明陵类同；石碑坊较明陵更具特点；碑亭石桥更加闳丽；石像生技艺形象较明陵略有不如等^[32]。

以上结论，是在刘敦桢另一篇大作《明长陵》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33]

四、对具体史学问题的铺垫与启发

作为清代陵寝研究的开拓性成果，在当时的研究条件和背景下，难免会遗留诸多问题供后人探索解答。刘敦桢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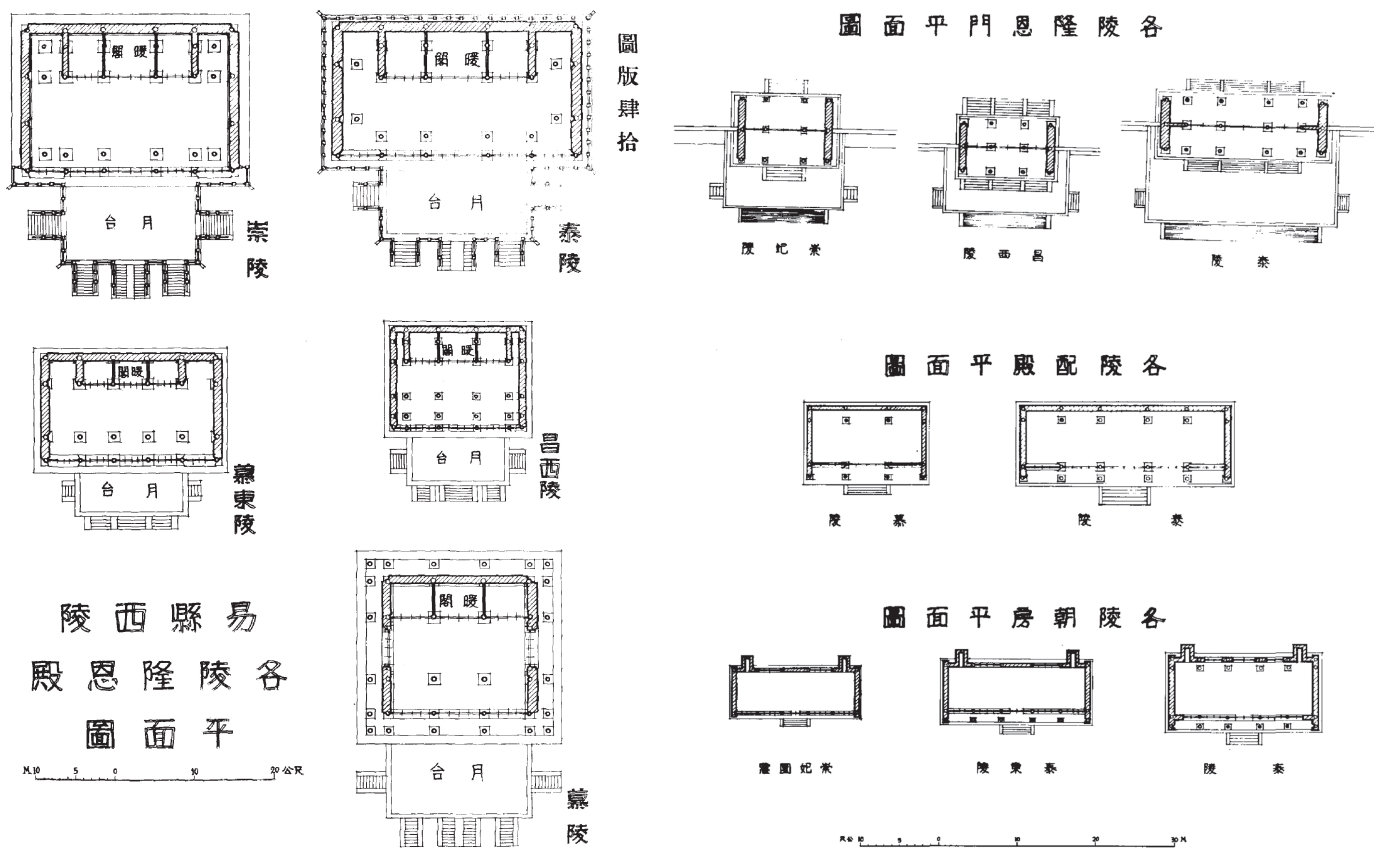


图10: 隆恩殿、隆恩门、配殿、朝房平面对比

也在文中提出了多项疑问以示后人：其一，陵寝太庙这样国家性质的祭祀建筑彩画为何与内廷彩画有显著差异？^[34]其二，史料记载慕陵仅废止营建圣德神功碑亭，而实际上慕陵既未建圣德神功碑亭，又未建方城明楼，其中缘由需“纪之以待后证”^[35]。其三，泰东陵的营建年代问题，“惟兴工与完工年代，尚待查考耳”^[36]。其四，为何清陵隆恩殿除昭西陵外均采用歇山顶，唯独大红门为庑殿顶，这似乎有悖体制，同时清陵既然效仿明陵，为何大殿没有继

续沿用庑殿顶的做法？^[37]其五，方城明楼的形制源于何时何地，是否在明孝陵以前就有运用？^[38]以上都关系着清朝陵寝制度史发展的重大变革，价值甚高，值得深究^[39]。文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明确说明，因时局所限，实物测绘与档案的发掘均未全面展开，致使无法对陵寝工程个案予以系统揭示。^[40]这是以后的陵寝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內容。诸如圣祖仁皇帝景陵的靠山名称，在当时乃至后续很长时间都鲜有学者明晰，直至天津大学王其

亨教授通过查阅档案^[41]及对证样式雷图（图11），方才确认景陵所在靠山为“五华岭”。此外还有很多史学问题至今都没有定论，如泰东陵完工时间仍未明确；景、泰、昌、定四陵石像生为何选择裁撤獬豸、骆驼和麒麟；昌陵按理应“逊避祖制”，为何单体尺度较泰陵更大，等等。这些内容实则在《易县清西陵》中都有提及，只是未引起当代学者的足够重视。再有文中所引的“东陵昭西陵全景”（图12）一图未注明出处，其来源及拍摄年代仍需考证^[42]。



图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东陵图(编号舆17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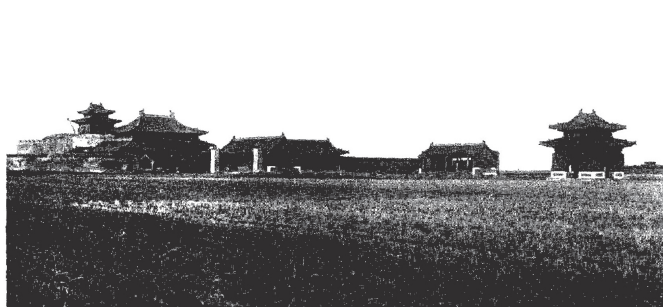


图12: 东陵昭西陵全景

值得一提的是，刘敦桢当时已然意识到陵寝设计与地势环境的关系，如提到神厨库的相对位置：“惟诸陵地势广狭不一，致神厨库位置，不尽相同”，以及为营造最佳的形势环境，进行的人工干预：“神道至此，为小山所阻，山为人工堆积，俗称蜘蛛山”“次过小坡，有河一道，自西往东，亦系人工开掘”。这些敏锐发现，无疑为以后研究陵寝风水形势及设计思想提供了重要启示。

整体回顾该文，刘敦桢已经将明清陵寝的研究框架基本勾勒了出来，营建史实、制度沿革、地宫形制、规划施工、风水环境等内容都需要不断深挖探究；后代学者仍需统一关注工程档案、史料文献、样式雷图档等研究材料，坚守文献考证、调查测绘、类型比对等研究手段。

五、结语

1. 《易县清西陵》的价值体现

从刘敦桢 1930 年代初期的研究成果来看，正是其对经史考据和考古实证方法的有机吸纳，方能敏锐发掘社会对建筑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从而按照建筑功能进行分类探讨。类型分析与经史考据相辅相成，可以最大限度地全盘把控中国建筑形制演变。相较梁思成等人专注建筑营造的风格化叙事，对中国建筑发展机制的宏观认识、动态地看待历史背景，恰是刘敦桢的学术特点之一。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只有他可以更深入系统地进行陵寝研究，这也奠定了《易县清西陵》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该文也开创了测绘研究与样式雷图档鉴别相结合的重要研究手段。

尽管刘敦桢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建筑的平面形式和组群布局，没有过多讨论单体建筑的结构或构件特征，但也并未将其完全舍弃，例如对一向神秘、鲜有旁人关注的清陵地宫，就用了大量笔墨予以揭示，弥补了相关建筑结构做法的一大缺漏。

2. 营造学社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然，刘敦桢的《易县清西陵》离不开中国营造学社一众巨匠长达十五年的积累与探索。基于中国营造史的研究，从 1919 年校勘《营造法式》起，到 1934 年《清式营造则例》的最终出版，用图示语言解读营造术语名词的核心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学社对明清官式建筑术语的持续关注，也为刘敦桢完成清西陵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研究术语名词并行的，是对流散在各个机构的样式雷图档的研究整理。围绕图档数量最为庞大的园林和陵寝，刘敦桢率先结合文献、工程档案等史料，详细解读了同治朝重修圆明园的相关史实，为研究和整理样式雷图档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实质性贡献。在此基础上，刘敦桢开始系统研究实物、图档、史料更为齐备的易县清西陵，尤其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测绘图纸，运用类型学方法分析归纳，使之不仅延续了中国文献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更吸纳了西方建筑学的思维模式，真正将“言、意、象”中的“象”充分演绎，无愧为中国建筑史学和遗产保护事业的奠基之作。

3. 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启示

如今从史学史角度回溯中国陵寝建筑的相关研究，其起步正始于刘敦桢，从最初《大壮室笔记》对两汉陵寝的文献考证，到结合实地调查写就的《明长陵》，再到集大成的《易县清西陵》，以及 1950 年代前后对六朝陵墓、南唐二陵的持续关注，刘敦桢始终将这一最能直观反映封建统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建筑类型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并将其带到极高的研究高度。在刘敦桢的影响下，营造学社成员陈仲篪、卢绳等人接续了相关建筑专题，前者对宋永思陵的形制考证见解颇深，后者在参与前蜀王建墓的考古发掘之外，将测绘调查的传统引入天津大学，最早开启了建筑院系对清代陵寝的系统研究；伴随《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刘敦桢在南京工学院的助手郭湖

生详细调查了河南巩县（今为巩义市）宋陵，使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研究成果终全面绽放。显然，《易县清西陵》一文无疑是刘敦桢对建筑社会性思考的缩影，其中既充分整合了自己过往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又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范本。

不过，20 世纪 60—80 年代，国内建筑界对明清陵寝的研究还鲜有突破，具体内容上，除陵圈、营房等方面有所进展外，整体认识仍主要停留在刘敦桢的已有成果，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从侧面反映了《易县清西陵》的学术价值，即其中提及和解决的史学问题深入而广泛。1980 年代以后，依循《易县清西陵》的研究思路，后辈学者将刘敦桢的未尽之功予以拓展，开始逐步取得阶段性突破，诸如天津大学在近四十年的清朝陵寝研究中调查测绘了几乎所有相关建筑遗存，同时深入挖掘档案文献、工程籍本，成功鉴别了 5000 余件陵寝样式雷图，真正兑现了刘敦桢所述“诸图中何为初稿，何为实施之图，亦得以证实”的承诺。

当然，受研究条件及时代背景的影响，即使《易县清西陵》这样的鸿文也难免会有纰漏，有些结论甚至还需推敲，但丝毫不影响文章的史学地位，相较具体结论而言，刘敦桢运用的研究方法、对陵寝建筑未来研究方向的前瞻性思考，才是后代学者所应始终学习的。更为关键的是，刘敦桢通过易县清西陵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类型，广泛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尝试对中国古建筑形成机制进行根本性探讨，从社会性角度发现中国古建筑的艺术特征，进而揭示建筑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嬗变，从本质上理解何为中国建筑。在阐释建筑形制特征的过程中，发现和解决相关史学问题，真正实现建筑史学的研究推进。在后续的中国古建筑研究中，仍需以《易县清西陵》为经典范式参照借鉴，秉持“文献、实物、图像”多重互证的研究方法，树立“典章、著述、档案”多维视角的完整史料观，以“样式雷图、测绘图、历史照片”为依据，夯实对“术语名词、造作结构”的理解，在史学研究中扎实基础，与此同时，将建

筑学的思维理论应用其中，从空间规划的角度发掘古代建筑设计思想，方能真正实现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核心要义。

注释

- [1] 因“前影印丁本，未臻完善”，朱先生随即委托著名出版家陶湘广征传本，以将付梓。经过反复搜集校对，1925年“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集辑成册，公诸于世。同年，营造学会成立，朱先生在“一面集资刊布”之余，仍坚持对“书中生僻之名词”悉心校读。
- [2] 民国18年(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虽已于天津创立，但囿于资金和图籍资料转存等问题，直到翌年一月方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资助下迁往北平，各方面工作才真正系统展开。《中国营造学社》第一卷第一期“社事纪要”中提到：“由津移往，于十九年一月一日，开始工作。”1929年6月3日，朱启钤先生以多年筹划之研究计划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开章明义地指出中国营造学在历史、美术、文化等诸方面的深远价值，围绕宋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释读演绎，构架出“沟通儒匠、睿发智巧”“资料之征集”“编辑进行之程序”相结合的缜密计划。
- [3] 《中国营造学社》第一卷第一期《中国营造学社缘起》。
- [4] 《中国营造学社》第一卷第一期《中国营造学社缘起》：“明清会典，及则例做法，今甲具在，由此推求，可明制度之因革……因会典及工部工程做法，有法无图……正拟增辑图史，广徵文献。”
- [5] 《中国营造学社》第二卷第一期《营造算例印行缘起》。
- [6] “现在由算的方法得以推求出许多样的则例，是一件极可喜的收获。”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130。
- [7] 《中国营造学社》第三卷第一期《本社纪事》。
- [8] 《中国营造学社》第一卷第二期《社事纪要——第一次工作报告中》关于“编订营造汇刊目录”一事。
- [9] “对于坟墓，需广泛征引考古家、美术家等记录保存之资料，配合近代图样模型影片加以考证。”前期整理的大量清代工匠制图和术语名词，都为研究包括明清陵寝在内的官式建筑体系提供了基础。
- [10] 刘先生在文中将“裱”写作“稊”，应是遵从长陵大殿匾上的“稊恩殿”写法。
- [11] 史箴，何蓓洁，高瞻远瞩的开拓，历久弥新的启示——清代样式雷世家及其建筑图档早期研究历程回溯[J]，建筑师，2012(1)。
- [12] 《中国营造学社》第一卷第二期《社事纪要——建议购存官苑陵墓之模型图样》。
- [13] 《中国营造学社》第一卷第二期《社事纪要——建议购存官苑陵墓之模型图样》所列“原开略目”：“东西陵路程图(俱全)，东西陵模型，东陵全图及各陵分图做法，西陵全图及各陵分图做法，东西陵各妃陵图，定陵圈分整图(附模型)，慕陵图，皇帝陵(大、小)卷(纸、木)模型，清永陵图，太后陵模型二份，各陵做法说明书，各尺丈做法说明书，陵工略节做法，大木陵图(大、小)券(方、宝)城各说明书(即尺丈做法)，地宫金井一份(俱全)，宝顶券模型一份”。

- [14] 引自：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民国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R]，1929：19。
- [15] 《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三期《本社纪事》。
- [16] 另有描摹的崇陵总平面图刊发在刘敦桢《明长陵》一文。
- [17] 然文中尚缺裕陵和定陵总平面图，致使无法一览所有清陵平面全貌。
- [18] “国221-005昌陵地宫券地盘样”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营造学社在描摹过程中省略了图上尺寸信息。
- [19] “国221-007”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 [20] “查旧案，录新编，并将档房工次，遵办一切次序，分为两门，此外全工规制，筹拨款项，黄册卷帙，奉安礼节，诸大端，以及零星事件，一一记述。”《中国营造学社》第二卷第一期《本社纪事——整理故籍之提要》论及整理已就者。
- [21] 引自：史箴，何蓓洁，高瞻远瞩的开拓，历久弥新的启示——清代样式雷世家及其建筑图档早期研究历程回溯[J]，建筑师，2012(1)。
- [22] 同上。
- [23] 其在《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研究》中提到图纸对于建筑研究的重要作用：“与建筑本身相比，图纸是最好的资料。这些资料会一直延续，即使建筑自身有所改变，还有图纸提供的可靠基础……只有在对比图纸，而非照片时，我才能够理解中国对建筑的思考。虽然照片通常是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基础，但也只能从图像上说明问题……”引自：彭思博译著第三章“柏世曼的研究成果(1909—1931)”(尚未出版)。
- [24] 引自：赖德霖，鲍希曼对中国近代建筑之影响试论[J]，建筑学报，2011(5)。
- [25] 《中国营造学社》第三卷第二期《本社纪事——社内事件》第一部分“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继续辅助本社经费函”。
- [26] “柏世曼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关联同时表明，中国建筑史话语的形成并非是中国近代几位建筑史先驱自说自话、孤立研究的结果；它还包含着他们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这种关联性对于研究中国建筑史学史尤其重要”。赖德霖，鲍希曼对中国近代建筑之影响试论[J]，建筑学报，2011(5)。
- [27] 同[25]。
- [28] 同[25]。
- [29] 引自：杨永生，刘叙杰，林洙，中国近现代建筑五宗师[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 [30] 文中提到：“台侧植松数行，其北有碾磑颇高，分为上下二叠，左右翼以石栏，与雷氏图所载定陵同。再北方城明楼之后，附哑叭院，宝城，宝顶，外绕罗锅墙，甬如常制，惟宝城南北特长，亦与定陵惠陵髣髴相类也。”
- [31] 选择以碑亭作为平面分区节点，既有图像认知上的考虑，又有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神道碑亭前后陵区空间性质有较显著差异；其二，明代诸陵绝大多数以神道碑亭为起点，据此方便说明明清陵寝间的传承关系；其三，神道碑亭以南建筑配置差异较大，需逐一强调，其北较为统一，可总体概括。
- [32] 具体方面包括：(1) 石牌坊：(泰陵)三坊雄峙气象千万，并非东陵与明长陵所可倖拟，不能不谓为西陵之特点也；(2) 大红门：三洞，单檐四柱，覆黄色琉璃瓦，檐端承以泉混曲线，俱同明陵；(3) 具服殿：殆仿明拂尘殿之制等等；(4) 石像生：像象生中，狮，象，马，及文武臣各二，皆立像。后者衣冠介冑，纯系清式，与狮

- 象等体积咸极矮小，视明陵诸像，瞠乎后矣。……均较明陵更为奢靡。明陵中，唯南京太祖孝陵与昌平成祖长陵有此制度。清东西二陵，自慕陵惠陵崇陵外，几无一不有像生；(5) 龙凤门：俱仿明陵规制，但明陵中仅孝陵、长陵有龙凤门，无用木石牌楼者；(6) 碑亭石桥：视明陵闳丽；(7) 神厨库宰牲亭：自成一廓，非明陵与清初关外诸陵所有也；(8) 东西朝房与东西守护班房：未见于明代记载；(9) 隆恩门至方城明楼：纯系模仿明陵；(10) 宝城宝顶：诸陵宝顶平面，除圆形一种外，复有两侧用平行直线，至前后两端，连以半圆形；与宝城方城之间，增设月牙城。以上俱非明代所有。
- [33] 今日研读，仍需逐条体量个个结论是否准确。
- [34] 文中提到“依规制言太庙殿寝为郊祀与奉安之地，在帝制时代，不应与大内彩画相若是，附记于此，以质读者。”
- [35] 对慕陵状况概括时提到：“慕陵制度如前所述，无方城明楼象生及圣德神功碑亭，而隆恩殿配殿宝城等，亦较他陵单缺，在清陵中最为特别。然考东华续录载宣宗遗诏，仅不许建圣德神功碑亭，今于明楼碑上，镌刻碑文，则方城明楼之废，非宣宗本意可知。岂阿片战役后，继以红羊之乱，清庭耐用匮乏，达于极点，致不得不变更旧制，而文宗咸丰二年一谕，讳而不书欤。纪之以待后证。”
- [36] 文中概述慕东陵时提到：“据故宫文献馆藏《高宗实录》，有大葬时更换殿座椽望，及修补墙垣阶砌一谕，知此陵建造已非一日，惟兴工与完工年代，尚待查考耳。”
- [37] 文中对泰陵各建筑单体逐一详述时提到：“所不可解者，之清之东西陵正殿(隆恩殿)，除东陵之昭西陵用四注外，余皆为歇山顶，而大红门独用四注，似与体制不符。岂踏袭明长陵旧法，而不知长陵正殿之为四注耶。”
- [38] 文中在“方城宝城”平面形式对比中提到：“方城其制，昞于何代，今尚不明，就今日所知者言之，似以南京明孝陵为最早。”
- [39] 现今个中问题已经能够解答，如慕陵为何未建方城明楼，王其亨先生曾撰写专文进行探讨，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财政难以维持；二是慕陵地宫内皇后奉安已久，不宜再惊动；三是慕陵规制特殊，地势不适合再建方城明楼。现国家图书馆藏有《现拟慕陵宝城一座等略节》及慕陵方城明楼方案设计图，也清晰表明咸丰朝确有拟补建方城明楼的史实，但最后未予实施。至于泰东陵的始建时间，据王胜利考证为乾隆二年(1736年)。根据范星盛《明楼建制渊源考》可知方城明楼的形制来源，最早应见于明皇陵，明皇陵明楼的原型，又取型于唐宋陵门。
- [40] 引自：史箴，何蓓洁，高瞻远瞩的开拓，历久弥新的启示——清代样式雷世家及其建筑图档早期研究历程回溯[J]，建筑师，2012(1)。
- [41] 文渊阁大学士戴钧元曾在给道光帝选择陵址的时候提到：“土丰脉秀，气聚水交。按其形势，考之图经，其龙由雾灵山发脉，至遵化州界起为昌瑞山作统龙之尊星，为入龙之少祖，复又左展奇峰，横开巨峰，名曰五华岭。”
- [42] 刘敦桢一行在此之前并未到过清东陵，因此该照片并非刘敦桢等拍摄。1928年9月清皇室曾对东陵进行调查，昭西陵东朝房仅存间架，宝顶上仅剩榆树一株，与照片中反映的状况相符，据此可以判定照片应摄于1928年9月之后，嗣后逊清皇帝溥仪责成载泽、耆龄等人前往修葺，但主要任务为地宫棺椁重殓，地上建筑未予修理。在刘敦桢调查西陵之前，曾有日本学者关野贞一行于1931年6月2日考察昭西陵，但未留下相关影像。